

典故、物象與符號化的生活世界： 關於明清詩文研究在方法上的思考

蔡英俊*

前言

緣於嚴志雄教授從中研院文哲所來到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系列與錢謙益詩相關的課程，並且也因著他的熱情投入，啟引了校內外研究生對於明清之際詩文研究的興趣以及風潮。志雄、鄭毓瑜教授和我個人都很期待，希望能夠藉此匯集國內研究明清文學的年青學者，共同努力在這個領域中開拓出堅實而有創意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了設立「明清詩文研究會」的想法以及工作方向與目標。在清華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與林聰舜教授前後兩位主任暨全系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獲得了基本的經費贊助，不但可以展開每月一次在文哲所進行的「講論會」，也舉辦了「明清詩文研究論文發表會」，更有了由謝正光教授擔任首次講座的「海外學者講座暨錢謙益論壇」。其中，2008年12月舉行的論文發表會中的主要論文，即將交由《清華中文學報》以「特輯」的方式出刊。我很高興能夠為這次的特輯撰寫一篇評論，藉此表達個人對於嚴志雄教授以及每一位與會成員的敬意，「以文會友」的意義或在於斯。

更重要的，這樣一段因緣際會，讓我能夠重新回到明清之際的那個時間點、想起曾經有過的一段時光。那時，聰舜正在撰寫他的博士論文，而年青的我們在清華見面的時候，我總會聽到他高興說著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等人的事蹟與思想，

*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能回應的也就是靠著在碩士班修讀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曾經一度懷有的對王夫之的熱情與好奇。因此，前兩三年，當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班幾位研究生因為志雄教授的鼓勵而試圖研究明清之際的詩文時，我同意指導、並且決定暫時捨離我自己熟悉的理論論述領域，跟著學生再次回到這一個所謂「天崩地坼」的時代，重新探索屬於「黑暗時代群像」這一群人物的生活世界。當然，目前的我只能是做為初階讀者的身分，敘述著個人在展閱這些研究成果時的觀察與思考；至於有關《明清詩文特輯》各篇論文的旨趣，王學玲教授在〈導言〉中已有了說明與發揮，因此，這篇評論只是我個人初步觀察與思考的所得，希望能先行做為這趟知識之旅的一份註記，並提供同好參考。

隱語系統與符號化的生活世界

明清之際做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材料，衍生了許多可能展開的議題，其中，士大夫與文人學者在面對「鼎革」所帶來的時勢變異時，必然牽動諸多關於個人自身進退出處、關於傳統特定價值的選擇，因而在這些面向上所留存的相關文獻資料，更是當前研究學者考察的重點。趙園女士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下篇，即以「較為開闊的背景」定義「明遺民」，強調「遺民人生是有待營造的」此一陳述：「明遺民構成清初社會的特殊族群，充分呈現了其作為時間現象，而又以特殊形態，表現了士的一般面貌；士對生存的道德意義的重視，士在與其時其世、與當代政治的關係中自我界定的努力」（頁256），遺民身分自然必須經過解釋轉化的建構程序。然而，她更自覺到面對此一建構程序時的困難。在引述余英時先生處理方以智晚節問題時所發的感嘆：「唯余考密之晚節尚別有一重困難而為通常考證之所無者，即隱語系統之破解是已。以隱語傳

心曲，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故考證遺民事迹者非破解隱語不為功」，趙園女士則也認定「『文字』或適足以障蔽了所謂的『真實』」，因此她更考量到「對於歷史生活、事件，可以經由文字復原的程度」、「為了保持某種解釋的『開放性』，宜於採取的敘事態度」等問題與可能性（頁 546-47）。

既有隱語系統需要破解的難題橫之於前、又有文字復原或障蔽的困境接之於後，其中更有著關於敘事的可能性若何的問題，那麼，設若要重建明清之際歷史生活世界的研究前景，何處可尋？我個人的想法則是：傳寫、表述與解釋過往經驗的途徑或許有二，一在於內在心緒或情感的觀照，發而為詩；一在於個別既定事件的講述，衍而為文。這裡所謂的「文」，當然可以廣義的泛指所有的古典散文、史傳、乃至於筆記小說等體式。然而，遺民階層受限於外在政治情勢的迫窘，「諱忌而不敢語，語焉而不敢詳」，且更有不必說、不想說的委曲，因此，文獻解讀的工作，顯然需要訴諸歷史傳記資料的爬梳以為佐證。尤有甚者，古典書寫場域中「意在言外」的創作理念，本來就容易衍生的比興、諷諭與寄託等手法，因此，直視真實更不會是書寫活動的標的。如果放入古典的書寫傳統來看，則余英時先生所指出的「隱語系統」，其實是建構在一個符號化了的隱喻與象徵世界，更多在於典故的借用與自然物象的轉喻等表現手法的運作。借用典故、摹寫自然物象，點染一片恍惚迷離的聲色光景，藉此傳譯某一種特定的情境、某一種片刻的心緒，卻從來不曾把這些個別的情境與剎那的心緒置放在時間之流當中，進而織串成可以理解並敘說的具體事件、或者努力構築具體事件中個別細節的連結與相關性。譬如龔鼎孳選擇了「貳臣」的身分，寫下了「平生擱筆梅花句，恐褻寒香點染中」這樣的停頓點，然後終其一生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不時回顧這個時間停頓點，或者以「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的推託進行自我的嘲

弄、或者在宴飲酬酢與登臨憑弔的活動中展演憂樂無端的內心幽微，但無論如何我們都難以清楚窺見他在選擇之後前後接續的種種具體事件，藉以明確構築並理解他後半生如何走過來的那一段具體而真實的生活。畢竟，就像黃淑婷論及龔鼎孳時所說的「一個怯於求死的生命，卻忘了活著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氣」（《生命的安頓——龔鼎孳交遊詩研究》，頁 22），我們想要理解並掌握的即是他如何具體面對活著的問題、還有他的勇氣。

典故，指向了一個過往已逝時空中曾經有過的經驗樣態，但那已經是點化過的認同；自然物象，則呈現了一個身外客觀、但可以感知觸摸的當下，可那是靜定不變的恆常，無與於人事的滄桑變化。因此，典故與物象符號所營造的隱喻與象徵世界，從來都不會是指實的具體生活。就在這裡，趙園女士的結論依然有效：「道德化，對精神事件的偏重，對生活物質層面的漠視或規避（其後果包括了有關記載的闕如、統計材料的匱乏）都限制著對歷史的『復原』；『生活』在文體、時尚的剪裁下，已不但支離而且單一化了」（頁 548）。如果試圖要突破文獻資料本身的這種限制，進而據實貼近並掌握那個變動時代具體繁複的生活圖像，可能需要我們更有想像力、但也更謹慎細緻的進行對於個別人物的解讀與分析。

循此，這一次《明清詩文特輯》中的各篇論文，多少展現了這樣的企圖與努力。請容許我逐一說來。

主題與變奏，還有賦格曲式

在這五篇論文當中，我們首先可以辨識某種不斷出現的相似的主題，那就是關於明清之際諸多人間情愛事件的解讀。錢謙益與柳如是的傳奇，固然不必多說，而吳偉業與卞玉京、屈

大均與王華姜以及冒襄與董小宛，也多有故事，如果再加上前面曾經提及的龔鼎孳與顧媚，那真是一個風雨飄搖、動盪不安，卻又多兒女情長故事的年代。這些情事艷史都曾經在當時廣為流傳，讓人稱頌。然而，也就在每一段故事的情節發展當中，愛情的本質都必然依附在某些更為深層的人際關係網絡而有了不同的重量。

「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稱得上是明末清初那個劇烈變動的時代的典型人物，他自身的生命與生活也即是由一連串的變動所組成。錢謙益與柳如是之間的結合，固然是當時極為聳動的事件，或讚頌、或驚訝、乃至於在船上迎娶時所招致的投石怒罵，都足以引發眾多無盡的討論，並且也可以讓我們藉此深入探索他一生起落的傳奇。方蓮華的論文，〈「梅」與「柳」的對話：錢謙益、柳如是在《東山酬和集》中之再現〉，似乎帶著一種女性的點慧與同情，以「梅」與「柳」之間互動的意象做為符徵，剖析了錢謙益與柳如是兩人之間相互往來的酬和詩，並且溫暖的揭開了柳如是生命內在細膩卻又不乏主動的心思，但是論文所呈現的畫面也就因此而停格在那美好單純的一刻。片刻即是永恆，即是美，即是真實。然而，細讀錢謙益一生的傳記資料，我們可以看見錢謙益迎娶柳如是時所引發的聳動與騷動，也看見了柳如是曾經有過的短暫的背離，更看到了錢謙益最後遺留給柳如是必須面對扛起的家難，至於最後的一幕場景，則是柳如是寫下了血書、然後上吊自殺。「梅」與「柳」誠然搖曳生姿，但是不能不殘落，其中仍有許多更為複雜曲折、並且讓人哀嘆不忍的發展。我們試看保留在王士禎文集中錢謙益自己所寫的一封書信，就如是說道：「亂後纂述，不復編次，緣手散去，存者什一；荊婦近作當家老姥，米鹽瑣細枕藉，煙薰掌簿，十指如椎，不復料理研削矣。」（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讀之不免讓人悽惋！昔日那曾經身著男裝、刻意引發

想像與遐思的柳兒，如今已是廚房中「當家老姥」的身影；白髮紅顏不復唱和，何來作品可以讓後生王士禎追想。想像不是生活，而生活也永遠不會是童話中讓人朗朗上口的那種結尾，柳如是如是，而同樣曾經引發屈大均豪氣的王華姜亦何嘗不如是。

在劉威志的論文〈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我建構〉中，我們隱約看到遺民身分的建構是透過愛情與婚約的形式完成的。除了情愛本身的相知相惜之外，更有著理念與價值的投射，因此一旦愛情的對象在歷經諸多折磨而殞歿之後，那種因為失去而來的創傷經驗便可能召喚出無比深沉的罪感，哀傷、悲痛、而且愧疚。劉威志除了肯定華姜情緣中「最原初、最純真、不經道德薰染的」愛情本質之外，他的細讀更揭露了王華姜生命早逝可能的理由，以及其中所含藏的現實生活中的委曲與悲苦。當然，「由史所不書處讀史」，這種解讀方法需要的是能夠出入字裡行間的想像力與穿透力，但是一旦進入解釋的步驟程序時，唯一的判斷準據就在於材料本身所能提供的解釋上的有效性。因此，屈大均的〈華岳百韻〉可以是把登華山的動作與當地「榆林忠烈」的遺民情感連結起來，藉此引發同遊者與當地人士的同感共鳴。然而，如果要進一步從〈華岳百韻〉中引用朱元璋夢遊華山的典故推斷屈大均的寫作策略：「渲染到彷彿建都關中的氣象，不也正討好並撫慰秦晉關中一帶，在有明二百多年來，並非首都的不平之鳴？」我們想繼續追問的問題即在於：有哪些文獻資料，可以充分用來證成「秦晉關中一帶一直存有並非首都的不平之鳴」這樣的論斷。

遺民身分當然是可以建構的，因此，「成為」一詞便饒有興味，引人想像。登上華山的動作，即是成為遺民並取得認同的一種方式，那當然也就另有其他的方式在了。胥若玫的論文，〈成為明遺民——以杜濬為例〉，即是以杜濬所在的「茅屋」做為杜濬成為明遺民過程的起始點，而往來穿梭於茅屋的人物，

如龔鼎孳、冒襄、吳綺等人，多少也藉此展開了「癒療傷心與自我救贖的可能」。因此，通往茅屋的路徑，或者被描寫為「梧竹路」、或者是「惡木路」與「他鄉路」，各自在點染的自然物象符號中相互取暖、同散百憂。杜濬所在的居室，即使連不具有移民身分的王士禎都曾在下雪日前往拜訪，因而有了康熙三年（1664）正月七日「清言竟日」的紀錄。假如杜濬所以選擇金陵雞鳴山尾做為居室之所在，主要是因為「力不能遷」，但也想遠離塵世、「陰利客之不能至焉」，那麼，這種刻意的設計正也是杜濬茅屋做為象徵符號所以吸引人的方式之一。「成為遺民」的動作或姿態，難免需要更多建構的力道與憑藉，想必從來都不是容易的。

錢謙益自己既已演出了「梅」與「柳」之間的風流事迹，當然也有意願成就所有可能演出的國士名姝的劇碼，因此他出錢出力為董小宛贖身，湊合了冒襄與董小宛的婚事，更也介入了吳偉業與卞玉京之間一段未能成就的姻緣。李欣錫的論文，〈錢牧齋〈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析論〉，即是以吳偉業顧念與卞玉京的舊情而寫的〈琴河感舊四首〉做為討論的起點，並兼及錢謙益對於這一組詩作的解釋以及錢氏寫的〈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後四首〉。李欣錫的論點在於強調錢牧齋對於吳偉業詩作的有意曲解，視之為有寄託故國之思的作品，其實就是在表露自我心迹：「其憂心梅村之令名不彰，即對一己復明心曲不能流傳後世之擔憂畏懼」。既然訴諸比興寄託的解讀方式，則錢謙益自己的詩作必然也刻意納入隱語系統的製作模式，而營造艱難深澀的典故、摹寫富豔迷離的意象氛圍，便也需要讀者勉力推求。李欣錫的論文詳細解說了吳偉業與錢謙益這兩組詩作的內容旨趣，論述文字典雅，卻也更錯落有致。最重要的，欣錫明確指出錢謙益的解讀也就是對於自我心迹的闡釋，當然更期待後世讀者能夠進行相同的解讀，因此，「此一動

機意圖之形成，乃建立在無法預知歷史評價的惶懼不安上」。錢謙益極力稱道的「詩史」概念，究竟說來，多少含藏了他生命底層最深最幽微的恐懼與顫慄：他一生多次試圖編寫歷史，這固然有他早年經世的思想與姿態在，但是在裁斷歷史之外，史家仍然需要面對自我生命的解釋與判斷。

錢謙益一生的起落浮沉，固然有許多不得已的因素以及機運的條件在，可以引人深思，但他選擇做為「貳臣」的行徑，卻無論如何都是他必須面對的問題；自我解釋與歷史評價之間的糾結，就此成為他後半生中念茲在茲的惶恐與困窘。基於這種強烈的「重視歷史評價」的動機意圖，錢謙益不僅有意曲解吳偉業詩作的旨趣，也反映在他對於過往歷史或人物亟於做出的評斷，而其中，錢謙益對於鍾惺所代表的「竟陵詩風」的污名化與攻擊，可能就是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王鏡容的論文，〈文學批評有情天：錢謙益對鍾惺之情誼與攻排探微〉，試圖區隔公領域與私領域可以產製的不同論述面向，藉此為錢謙益對鍾惺的攻排動作保留些許溫暖的情誼成分。然而，我們試想，錢謙益與鍾惺彼此為同年進士（萬曆三十八年，1610），但隨後錢謙益走向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古文派學術、並且身繫東林，以經世為己任，因此，當鍾惺在詩壇上造成並推行「竟陵詩風」的時候，錢謙益還沒有在詩壇上建立名聲；他的名聲在其他的活動場域。然而，在一連串經歷了學術與政治場域中的挫敗之後，錢謙益開始走向了詩的世界，可能就在這種機緣下，鍾惺成為錢謙益「影響焦慮」下的對象；領袖群倫的慾望澆熄了原本曾有過的微溫的情誼。晚明是一個各立門戶、相互詆毀的年代，政治如此、學術如此，詩的世界何能自外於此？

變動可能是有明一代的特質，晚明此一階段尤其如此，而錢謙益更是劇烈變動年代中的典型。然而，歷史或許永遠變動、

人事或許永遠生滅，但個別具體的生命卻有時不願意接受或忍受生滅與變動。借用典故、摹寫自然物象，讓所有的剎那與變動都可以化作凝定的永恆。於此，在經歷了天崩地坼的變動之後，一種嶄新的生命樣態慢慢浮現了，試圖擺落所有的創傷記憶與罪感、試圖遠離所有的變動與悲痛，那就是王士禎為代表的新聚落；他的〈秋柳詩〉即是第一個徵兆，而「神韻」的論述與實踐則是他通往永恆凝定的咒語。順治十四年（1657）明湖詩社的聚會，招集了各方人士，當然也包括眾多的遺民，這時候，王士禎可能以錢謙益與柳如是的傳奇做為好奇想像的材料，而〈秋柳詩〉所摹寫的富豔迷離的意象氛圍就此成為新舊記憶的交會點，也讓王士禎進入了歷史的舞台。明湖詩社的聚會上，王士禎有意操弄；他是視覺的動物，他那銳利的雙眼不動聲色的在過往歷史黑暗的叢林中搜尋、注視，最後選擇了愛情的主題，歌詠既可以普遍存在的人間情愛、但又可以昇華且依附在比興詮釋系統上的香草美人。王士禎掌握、並且也消費了以錢謙益與柳如是為代表的系列白門傳奇故事。嚴志雄分析王士禎〈秋柳詩〉的長篇敘述，〈王士禎〈秋柳詩四首〉新探〉，讓我們詳實而明確的看到了一個志在功名、且沒有創傷記憶與罪感的生命，如何凝視那個他曾經熟悉、但不需回顧、也沒有意願投入並沉溺的過往。志雄這篇論文，描繪了一個新舊年代的交替，讓人驚嘆，只可惜並沒有能出現在這個特輯，但是其中的第一部分曾經在「明清詩文研究論文發表會」中發表，因此，我特為這樣一篇論文留下可供參照的記憶。我知道：比起錢謙益來，志雄並不是那麼喜歡王士禎，但他也一定不會很同意我直接就這樣做出論斷，即把〈秋柳詩〉所可能描述的對象等同於錢謙益的白門傳奇。以志雄治學的精細嚴謹，他會要求我提出更多的論證與論據；也許，我會找個時間先寫一篇有關錢謙益與王士禎的論文，請他評論。

以〈秋柳詩四首〉出現的時間點為界，分開了錢謙益所極力張揚的「詩史」與王士禛已然緩緩鋪陳的「神韻」，然而，就在這兩個不同型態的生活世界之間仍有許多可供探詢的論題。因此，我期待第二次「明清詩文研究論文發表會」的到來。